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Denotation and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Non-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JIANG Guangsheng & HE Aiju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a

Received: April 20, 2024

Accepted: May 20, 2024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JIANG Guangsheng & HE Aijun. (2024). The Denotation and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Non-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3), 120–127,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3.015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3.015>

Abstract: The rise of Non-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is due to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multilingual education, and cyberspace. To be specific, translation technology empowers netizens with translation competence, multilingual education facilitates the netizens' utilization of linguistic resources critically and creatively, and cyberspace provides netizens with a platform to respond to social reality.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he translation norm and the authority, Non-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popularization and freedom and its participants enjoy full self-empowerment. The Non-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re-narration in nature with three features, i. e., the narrator being assembled, the narrative content being rebellious, and the narrative development being spatiotemporal. It can not only widen expression space but also provide access to social reality and engag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Keywords: Non-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mass translation; 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HE Aijun is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His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translation theorie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geo-translation studies.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50 academic papers in journals and co-edited over 10 academic monographs and translation works. JIANG Guangsheng holds a master's degree in translation, graduating from the MTI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His academic interest lies in translanguaging application in translatio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y,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非建製性翻譯的概念界說與敘事特征

姜廣勝 賀愛軍

中國海洋大學

摘要:非建製性翻譯的興起得益於翻譯技術、多語教育、網絡空間的發展。翻譯技術為網民的大眾翻譯賦能,多語教育便利了網民創造性、批判性地運用語符資源,而網絡空間為網民回應社會現實提供了平臺。非建製性翻譯活動具有大眾化和自由化的特點,不受翻譯規約和權威製約,參與者享有充分的自我賦權。它本質上是一種翻譯再敘事,其敘事者具有聚集性,敘事內容具有反抗性,敘事發展具有時空性。非建製性翻譯通過對文本符號的翻譯重構不僅能夠擴大表達空間,還能夠提供一種認知社會現實的視角,參與社會現實的構建。

關鍵詞:非建製性翻譯;大眾翻譯;建製性翻譯

一、引言

翻譯可以從多個方面予以分類,如果從翻譯主體所代表的利益來看,翻譯可分成建製性翻譯(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和非建製性翻譯(Non-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建製性翻譯指的是代表機構或本著機構利益的個人或集體開展的語言轉換行為及其產品。建製性翻譯源遠流長,從古代佛經譯場到晚清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等翻譯機構,再到當下的中國外文局和外交部等相關部門,這些機構或部門開展的翻譯活動均可歸為建製性翻譯。建製性翻譯包括官方翻譯、公共服務翻譯、國家翻譯等,一直是翻譯研究的重點。然而,與建製性翻譯同樣歷史悠久的非建製性翻譯長期存在,但相關研究所見不多,成果明顯不足。近年來,隨著互聯網和翻譯技術的進步,非建製性翻譯悄然興起,走紅於網絡。這種翻譯活動遊離於製度化的翻譯生產體系之外,依賴翻譯工具在虛擬網絡世界進行。有學者稱之為「改造式翻譯」,認為這種自發的翻譯活動實現了某種狂歡,消解了嚴肅權威(鄒常勇、朱湘軍,2021),也有學者稱之為青年網絡亞文化的溫和抵抗活動(敖成兵,2019),我們將這類翻譯統稱為非建製性翻譯。下文將基於國內外社交平臺上的非建製性翻譯現象,提煉其本質、內涵、敘事特征及其管理。

二、非建製性翻譯的概念及其策略

「建製」原意為國家機構或者團體內的編製和系統,具有正統性和主導性,「建製性」可由此延伸為製度化、體系化、規約化取向,即製度化、體系化的運行模式。在翻譯領域中,建製性翻譯通過組織結構製度化、人才培養製度化、生產流程製度化、倫理規範製度化對參與者進行賦權(詹成、張晗,2023:96),這種翻譯活動服務於國家或者民族敘事,具有「濃郁的意識形態性、強制性和獨斷性」(任東升、高玉霞,2015:20)。

與建製性翻譯不同,非建製性翻譯指的是自發的、不代表任何集團或者任何國家利益的個人翻譯行為。它具有主體零散性、行為自發性、敘事狂歡性的特點。主體零散性指的是非建製性翻譯的發起人、執行者屬於零散個體,不隸屬於任何組織和機構;自發性指的是非建製性翻譯活動的發起人和執行者不代表任何組



織或機構的利益,不存在任何組織或者機構的贊助、動員、管理;敘事狂歡性指的是非建製性翻譯行為具有自由化和隨意化傾向,主要目的是通過非常規的翻譯行為引起關注、消解權威。

主體零散性、行為自發性和敘事狂歡性造就了大眾網民豐富的翻譯策略,因為相比處於翻譯生產體系中受翻譯製度和贊助者意志約束的職業譯者,非建製性譯者的翻譯活動能夠擺脫贊助者意志,注重自我精神滿足而非獲得經濟效益或者文化效益,從而拒絕源自贊助人意識形態的束縛,「並在嬉笑中解構傳統社會關係」(Zhang, 2015: 244)。非建製性譯者能夠擺脫翻譯製度和規範的束縛,在翻譯過程中沒有委托人、編輯、出版社的製約,也沒有翻譯體例、術語表、合同等規範約束,因而採用的翻譯策略具有隨意性,如語際雙關(interlingual punning)、牽強音譯(transliteration contrivance)、文化操縱(cultural manipulation)、話語雜糅(discursive hybridity)(Yuan, 2020: 629)、創譯、反說、超額翻譯等。在這種翻譯活動中,翻譯等值讓位於幽默、戲謔、諷刺等不同的翻譯取向。非建製性翻譯的內容十分自由,流行語、稱謂、寒暄語。表情符號等都可能成為翻譯的源文本,需要強調的是非建製性翻譯活動固然具有大眾參與和嬉戲自由的標籤,但非建製性只是敘事傾向方面的概括,具體影響應取決於對社會、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影響。

三、非建製性翻譯的敘事特征

基於不同側重點,如專業度、傳播媒介、群體共性等方面,非建製性翻譯的內涵定義多樣,已有的定義包括「眾包翻譯」或「線上合作翻譯」(online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Jiménez-Crespo, 2017)、「社區翻譯」(community translation)(O'Hagan, 2011)、「線上社會翻譯」(online social translation)(Dolmaya & Ramos, 2019)、「媒介驅動的翻譯」(social-media-driven translation)(Hebenstreit, 2019)以及「業餘翻譯」(amateur translation)(Pérez-González & Susam-Saraeva, 2012)等。以上研究都不約而同將網民大眾作為翻譯主體研究,但是對於翻譯文本關注不足,尤其是翻譯文本中蘊含的敘事空間。「非建製性翻譯活動」從定義上便凸顯了其文本的非建製性的總體敘事特征,個體或者少數派通過對符號的轉換創造出一個可被會意的共同敘事空間。非建製性的定義包含了符號和文本的嬉戲、聚集性和反抗性和社會歷史性。

非建製性翻譯通過對符號或文本的嬉戲翻譯,實現對社會現實或(和)主流公共敘事的再敘事。多樣性的翻譯內容拓寬了民眾敘事空間,其中大量的個人敘事呈現出不同於主流敘事的個人歷史境遇。人們通過多樣化敘事,構建對社會現實的認知。我們對自我、他人和世界的再敘事會重新過濾我們對社會現實的認知,也會成為我們建構社會現實的一種方式(Baker, 2014: 159)。非建製性翻譯的再敘事與主流敘事不同,通過考察「什麼內容被選為翻譯和如何被翻譯」(Baker, 2014: 165),可以挖掘出異於公共敘事的個人敘事以及這種個人敘事的社會建構作用。個體再敘事具有聚集性、反抗性、時空性的特征。聚集性指的是敘事參與者的組織形式,反抗性指敘事內容的反權力規訓的特點,是個體再敘事的核心內容,而時空性指敘事的發展特征。

個體再敘事的聚集性表現為敘事參與者因為個體喜好傾向等原因參與到某一話題的表達。在網絡時代,聚焦行為具體表現為社區、標籤(tag)、博主賬號等形式,例如百度貼吧中的「權力的遊戲」社區對小說部分內容進行翻譯和探討,參與者的聚集無疑會放大再敘事的效果和影響。網絡社會是一個由多元的信息和權力流動網絡交織而成的社會(李耘耕, 2018: 63),在網絡匿名環境中不同個體的敘事相互共享,現實的文化符碼在虛擬環境中被拼貼組合進行「隨意性的情節編織(causal emplotment)」(Baker, 2014: 158),實現敘事的再生產、敘事流動、敘事消費。非建製性翻譯活動的參與者聚集敘事因其內容會產生不同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影響,其可能會帶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出去,對文化傳播產生廣泛的影響,也可能成為不法分子進行輿論攻擊和顏色革命的話語武器。就前者而言,國內網友自發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節日、服飾、器具

等內容翻譯到國外,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的深厚底蘊(見圖1),在國內社交平臺如微博超話「文化輸出現象」裏成員整理歷代華夏服飾傳播至國際社交平臺,及反擊了一些文化偷竊現象有展現中華源遠流長的服飾文化,這無疑是非建製性翻譯的積極作用。就後者而言,非建製性翻譯活動超出翻譯製度和法律法規的束縛便會使這種敘事成為輿論武器,以推特上「大翻譯運動」為例,其參與者熱衷於將國內負面輿論翻譯成各國語言傳播到國外社交平臺,從而醜化中國國家形象。例如在日本首相遇刺之後,他們將國內一些網民的不理智評論翻譯成英語發到推特上。翻譯本應溝通不同文化,實現文化交流與互鑒,而「大翻譯運動」的聚集性翻譯行為卻成為意識形態鬥爭的工具。



圖1 某博主在海外社交媒體平臺上宣傳漢服

從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在網絡空間中,聚集性敘事通過對現實符碼的任意編製來實現國家形象的構建,網絡空間為各種文化意識形態的傳播提供了最為直接的表達空間,而新技術的應用打破了傳統意義上的主權邊界,也瓦解了國家形象建構過程中的傳統手段和方式(張愛軍、賈璐,2021:60),網絡傳播賦予了大眾建構國家形象的能力。非建製性翻譯活動通過在網絡空間中聚集性的敘事對國家形象施加特定影響,既可以為國家形象帶來負面影響,也可以成為文化輸出的有機組成部分。

非建製性翻譯活動的敘事內容具有反抗性的特點。邊緣化的個體通過翻譯實現自我敘事,實現對主流敘事的反抗。參與者使用翻譯實現多樣化敘事,這種「再敘事」類型的翻譯活動多以表達戲謔、反抗、叛逆或者自由等精神為追求。Baker(2013)認為作為社會活動分子,譯者能呈現出比其他團體更具戰鬥力的一面,譯者追求發聲和拓寬敘事空間,他們意識到語言和翻譯中包含抵抗空間,具備顛倒符號秩序的能力。非建製性翻譯通過對現實符碼的翻譯實現個體生存境遇的敘事,構建一條異於主流敘事的認知社會現實的路徑。例如,「房地產」被翻譯成「propoorty」,將原本的「per」替代為「poor」(意為貧窮),翻譯出「令民眾貧窮的房地產」的含義,它是對房地產業對人民財富掠奪的諷刺;將「shitizen」譯為「屁民」,傳達了在媒體宏大敘事宣傳下,對個體價值「原子化」的無奈嘲諷。可以看出,非建製性譯者並不像建製性譯者那樣注重原文與譯文之間的忠實與等值,而是強調翻譯產品在傳播中的關注度。因為翻譯傳播越廣,便愈能戲謔狂歡、消解權威、批判現實。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敘事是一種共識,反映了群體生存境遇。這種反抗性的自我表達可能會與現行主流文化、社會意識形態規約相沖突,翻譯和多樣性的符號不僅具有拓寬敘事空間的意義,也是對現實審查與主流敘事的規避,「進入賽博空間,成為電子人,或許可以隱遁物理/生物學的身體,但在歷史和現實框架中被文化規製的主體卻無法真正、完全地被壓抑或消解」(林秀琴,2020:165)。通過創造性翻譯,個體既避免了與主流敘事的直接沖突,又在嬉戲和諷喻中解構了主流敘事,實現個體敘事。

所有敘事均有其時間和空間的構成(Baker, 2014: 167),非建製性翻譯同樣具有時空規定性。非建製性翻譯的時空性指的是敘事內嵌於特定時間和空間,體現特定歷史空間和時間。這種敘事是某一群體化的



語言意識形態,是在社會歷史文化建構下觀念體系的語言表達(Kroskrity, 2010; Wang & Fang, 2018)。譯者在翻譯敘事中注入自身或社會經驗、時下網絡流行話語等來解構原文,甚至故意用娛樂性、搞怪式的語言(鄒常勇、朱湘軍,2021:34),網民對符號資源進行批判性、創造性運用,對各種表情和符號對嚴肅文本進行解構,迎合了大眾網民既要「高大上」又要「接地氣」的表達需求,也表達出一種戲謔和自由娛樂的態度。這種翻譯活動的再敘事發生於特定時間背景和地域空間。例如,在2017年教師節,在網絡上流行將「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譯為「傳 door, show 業, 解 who」,意為老師是為你打開一扇門的那個人,為你提供學業、事業展示平臺的那個人,使你不再問「我是誰」而迷失自己的那個人,傳達出對教師別樣卻真摯的祝福;「Exhausted, exhausted, I'm exhausted」被翻譯成「累死了,累死了,每天996我累死了」是對不平等勞資關係的溫和抵抗;「I'm not in danger, I'm the danger」被譯成「我不是密接,我是陽性」則折射出網民對新冠疫情肆虐的無奈和調侃。

四、非建製性翻譯的形成緣由

非建製性翻譯是時代發展的產物,它的興起得益於多語教育的普及、網絡空間和翻譯工具的發展。語言技能不僅僅是讀寫的交際技能,李崑、沈騎(2021)指出多語者能夠以嬉戲的方式操控語言,創造出新的表達方式,從多維角度對社會現實做出質疑與批判。權威塑造需要設立各種話語禁忌,反之話語也可以用來解構權威,消解嚴肅,表達自由和反抗,通過符號操縱回應主流敘事和社會現實。這種嬉戲式的翻譯解構了嚴肅性和權威性,權威的神聖性和嚴肅性被充滿自由、反抗、戲謔的非建製性翻譯消解(鄒長勇、朱湘軍,2021:36)。翻譯技術帶來的是翻譯主體的解放,技術不僅影響翻譯的本質概念,也改變了譯者的角色、關係和地位(Jiménez-Crespo, 2020: 315; Munday, 2008: 192)。當下各種機器翻譯和計算機輔助翻譯工具層出不窮,人工智能工具(如ChatGPT、文心一言、悟道等)基本滿足了大眾翻譯需求。翻譯技術使得大眾能夠像專業譯者那樣進行翻譯並實現傳播,翻譯技術增強了大眾的翻譯能力,以往專業譯者從事翻譯需要學習大量的詞匯、語法、文化知識和翻譯技巧,而現在多樣化的翻譯工具和豐富強大的語料庫極大地降低了翻譯門檻,使得翻譯成為一項人人可參與的社會活動。

「網絡空間為翻譯產品的傳播搭建了舞臺,數字科技的發展帶來了新的翻譯參與者生態,同樣改變了翻譯生產、傳播和消費方式」(Zheng et al., 2023: 300),網絡傳播具有傳播速度快、即時性、開放性、分享性和交互性的特點,具有現實生產過程無法比擬的優點,互聯網讓使用者從單純的信息消費者變成了產消者(Lee, 2017: 92)。網絡空間具有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特點,網絡是人、事物、體製的多點聯系,網絡空間的發展削弱了現實世界的垂直結構對個人身份的建構(Urry, 2000: 37),呈現出平行性和分散性。人與人之間的身份和權力關係在網絡空間中發生了變化。網絡虛擬世界權力結構的層級關係也不僅與現實世界不同,甚至會破壞現實世界的層級關係(Jordan, 1999: 59)。網絡空間消除了現實空間中的權威和規約監視,譯者成為自由個體,能夠實現自我意志展示,充分展現多樣性的意義建構以及多元化的社會影響。在紙質閱讀逐漸減少、人們進入網絡化、碎片化閱讀的當下,這種虛擬空間的意義建構對社會的影響將越來越大。如今互聯網早已滲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非建製性翻譯的話語實踐對社會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可以預見,隨著技術的進一步迭代更新,非建製性翻譯的大眾參與度也必將越來越高。

五、非建製性翻譯的作用及其治理方式

非建製性翻譯從另一種角度參與社會政治。一方面,就社會內部而言,語言資源的嬉戲表達和創新運

用表現出對社會現實的批判,開辟出一條區別於官方宏大敘事和主流意識形態的敘事空間。非建製性翻譯通過語言顛倒式的翻譯實現個體的話語表達,在諸如性別平等、環境汙染、社會政治等方面發出個體價值取向的聲音,關注社會主流宏大敘事下的「原子化」個體的精神現狀和生存價值。儘管存在不和諧的聲音,但是大多時候下網民大眾將對社會和國家的道義期望寄於翻譯文本之中,翻譯成為大眾認識、監督和批評社會的重要工具,該類敘事折射出當下社會的不足,為社會治理提供借鑒。

另一方面,如果相關部門能夠積極引導,非建製性翻譯和建製性翻譯可以形成互補,共同促進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出去」。國家形象塑造是一項由上至下的系統工程,需要全方位、多主體參與,其主體不但包括政府,還包括媒體、企業和全體國民(程曼麗、王維佳,2011:36)。國家製定翻譯政策和項目,實施翻譯規劃,進行翻譯產品流通,這種體系化運作服務於國家形象塑造、國家利益維護和國家話語權提升等(任東升,2019:71)。這種傳播投入大、規模大,但是官方傳播容易被視為帶有文化和政治目的,因此在對外宣傳中為他國民眾所抵觸和質疑。此外,官方傳播往往是中心化的,難以實現深度傳播。儘管翻譯投入巨大,但未必能夠取得預期宣傳效果,如有學者指出「大中華文庫」等出版物的傳播效果不佳並不是因為翻譯質量差或傳播價值低,而是宣傳推介等原因(陶友蘭、趙田園,2023)。中國特色對外話語體系的譯介與傳播面臨著本土與世界、傳統與現代、政府與民間、中心與邊緣等多個話語變量的沖突與挑戰(胡安江,2020:48)。在網絡時代,社交平臺逐漸取代紙質媒體,成為信息的主要傳播渠道,在互聯網上實現中華文化的高效傳播需要大眾網民的廣泛參與。國內的非建製性翻譯如果能正確引導與規範,則有利於傳播中華文化,塑造中國形象。雖然民間力量在參與跨文化溝通的過程中不如官方那般經過系統化的思考和嚴密論證,但卻是不容忽視的群體(孫祥飛,2021:19):第一,平民化的敘事能夠實現去中心化、扁平化的傳播,降低文化傳播中的抵觸心理;第二,多傳播媒介方式豐富了傳播內容,圖片、視頻並配以文字的傳播方式契合當下的生活方式,大大降低了傳播阻力。

然而,非建製性翻譯活動也存在著不足,需要引導和治理。網絡公共空間與技術雖然能夠為翻譯傳播提供便利,但是大眾的自由參與同樣會使非建製性翻譯變得無序和混亂。在建製性翻譯活動中,建製性譯者受到職業倫理驅使和審查製度監督,譯文質量和意識形態安全得到了保證,而大眾網民遊離於翻譯生產體系之外,缺少這種職業道德觀念,翻譯極易成為互相攻訐的武器。對於非建製性翻譯活動的引導重於治理,就網民自發翻譯宣傳中華文化的活動而言,可以從兩方面予以引導。第一,實現翻譯標準化和翻譯資源社會共享。鑒於大眾網民的翻譯水平,對於各種文化器物翻譯難免混亂不一,因此,製定統一的文化器物翻譯標準並進行資源社會共享對於網民宣傳文化有所助益。第二,實現官媒傳播與大眾網民翻譯活動相結合。二者攜手,能夠實現相互合作,優勢互補,擴大非建製性翻譯活動的影響力。

六、結語

本文梳理了非建製性翻譯活動的概念與內涵、敘事特征、形成緣由、作用及其治理方式。非建製性翻譯處於翻譯活動的邊緣地帶,具有大眾化和自由化的特點。它脫離了建製性翻譯活動生產體系,避免了各種權力資本操縱,充分實現了「自我賦權」。非建製性翻譯的興起得益於語言教育、網絡空間和翻譯技術的進步。在敘事特征方面,非建製性翻譯活動作為個體敘事,具有聚集性、反抗性和時空規定性等特征,通過翻譯實現多樣性的個體敘事,從而構建認知社會現實的新路徑。大眾網民自發的翻譯活動有利於廣泛宣傳中華文化,但由於網民群體的龐大以及翻譯職業道德意識的缺位,非建製性翻譯又很容易淪為輿論武器。發揮非建製性翻譯活動的積極作用重在引導,通過規範翻譯內容和官民合作翻譯等措施可以促進非建製性翻譯的良性發展。可以預見,隨著網絡與翻譯技術的不斷發展,非建製性翻譯活動定會不斷壯大,對社會、文



化和政治產生的影響也必然日益明顯。

注釋

- ① Baker, M. (2013). Translation as an Alternative Space for Political Action.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2(1), 23–47. 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 ② Baker, M. (2014). Translation as Re-narration. In House, J. (ed.). *Transla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P. 166–167. 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 ③ Hebenstreit, G. (2019). Coming to Terms with Social Translation: A Terminological Approach. *Translation Studies*, 12(2), 139–155. Graz: University of Graz.
- ④ Jiménez-Crespo, M. A. (2017). *Crowdsourcing and Online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s: Expanding the Limit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39(2), 284 – 286. New Jerse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 ⑤ Jiménez-Crespo, M. A. (2020). The “Technologic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We There Yet? A Transversal Cross-disciplinary Approach. *Translation Spaces*, 9(2), 314–341. New Jerse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 ⑥ Jordan, T. (1999). *Cyberpower: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yberspace and the Internet*. P59–60. London: Routledge.
- ⑦ Kroskrity, P. V. (2010). Language Ideologies — Evolving Perspectives. In Jaspers, J., Östman, J. & Verschueren, J. (eds.). *Society and Language Use*, P. 192–21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⑧ Lee, J. (2017). Crowdsourced Translation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A Case Study of Flitto. *The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8(4), 91–120. South Korea: Keimyung University.
- ⑨ Dolmaya, J. M. & Ramos, M. M. S. (2019). Characterizing Online Social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udies*, 12(2), 129–138. York: University of York.
- ⑩ Munday, J. (2008).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P. 191–192. London: Routledge.
- ⑪ O’Hagan, M. (2011). Community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s a Social Activity and Its possible Consequences in the Advent of Web 2.0 and Beyond. *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New Series — Them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10(275), 11–23. Dublin: Dublin City University.
- ⑫ Pérez-González, L. & Susam-Saraeva, . (2012). Non-professionals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Participatory and Engaged Perspectives. *The Translator*, 18(2), 149–165. Norway: University of Agder.
- ⑬ Urry, J. (2012).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37–38. London: Routledge.
- ⑭ Wang, W. & Fang, F. G. (2019). Chinese Netizens’ Reactions to the Use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nglish Today*, 35(4), 3–12. Wuhan: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 ⑮ Yuan, M. (2020). Ideological Struggle and Cultural Intervention in Online Discourse: An Empirical Study of Resistance Through Translation in China. *Perspectives*, 28(4), 625–643. Shantou: Shantou Univerity.
- ⑯ Zhang, W. (2015). Multilingual Creativity on China’s Internet. *World Englishes*, 34(2), 231 – 246.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 ⑰ Zheng, B., Yu, J., Zhang, B. & Shen, C. (2023). Reconceptualizing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ors in the Digital Age: YouTube Comment Translation on China’s Bilibili. *Translation Studies*, 16(2), 297–316. Durham: Durham University.
- ⑱ 敖成兵:《青年網絡亞文化的溫和抵抗:特質、緣由及審視》,《當代青年研究》,2019年第2期,頁78–84。
- ⑲ 程曼麗、王維佳著:《對外傳播及其效果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頁36。
- ⑳ 胡安江:《中國特色對外話語體系的譯介與傳播研究》,《中國翻譯》,2020年第2期,頁44–51+188。
- ㉑ 李菟、沈騎:《超語實踐理論的起源、發展與展望》,《外國語》,2021年第4期,頁2–14。
- ㉒ 李耘耕:《從規訓到流動:數字媒介網絡的權力實踐模式轉變》,《學術研究》,2018年第3期,頁59–66+177。
- ㉓ 林秀琴:《後人類主義、主體性重構與技術政治——人與技術關係的再敘事》,《文藝理論研究》,2020年第4期,頁159–170。

- ②④ 任東升、高玉霞:《翻譯製度化與製度化翻譯》,《中國翻譯》,2015年第1期,頁18-23+126。
- ②⑤ 任東升:《國家翻譯實踐概念體系構建》,《外語研究》,2019年第4期,頁68-73+112。
- ②⑥ 孫祥飛:《「異托邦」的中國形象: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之外》,《新聞愛好者》,2021年第10期,頁17-21。
- ②⑦ 陶友蘭、趙田園:《中國文化外譯實踐與研究的現狀、挑戰與發展趨勢——陶友蘭教授訪談》,《山東外語教學》,2023年第2期,頁1-6。
- ②⑧ 詹成、張晗:《行動者網絡理論視閥下的國家翻譯實踐研究》,《中國外語》,2023年第5期,頁96-102。
- ②⑨ 張愛軍、賈璐:《互聯網視域下的國家形象建構》,《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頁57-64。
- ③⑩ 鄒常勇、朱湘軍:《網絡翻譯傳播中的「改造式翻譯」:青年網絡亞文化的視角》,《上海翻譯》2021年第3期,頁34-38。

(Editors: JIANG Qing & Joe ZHANG)